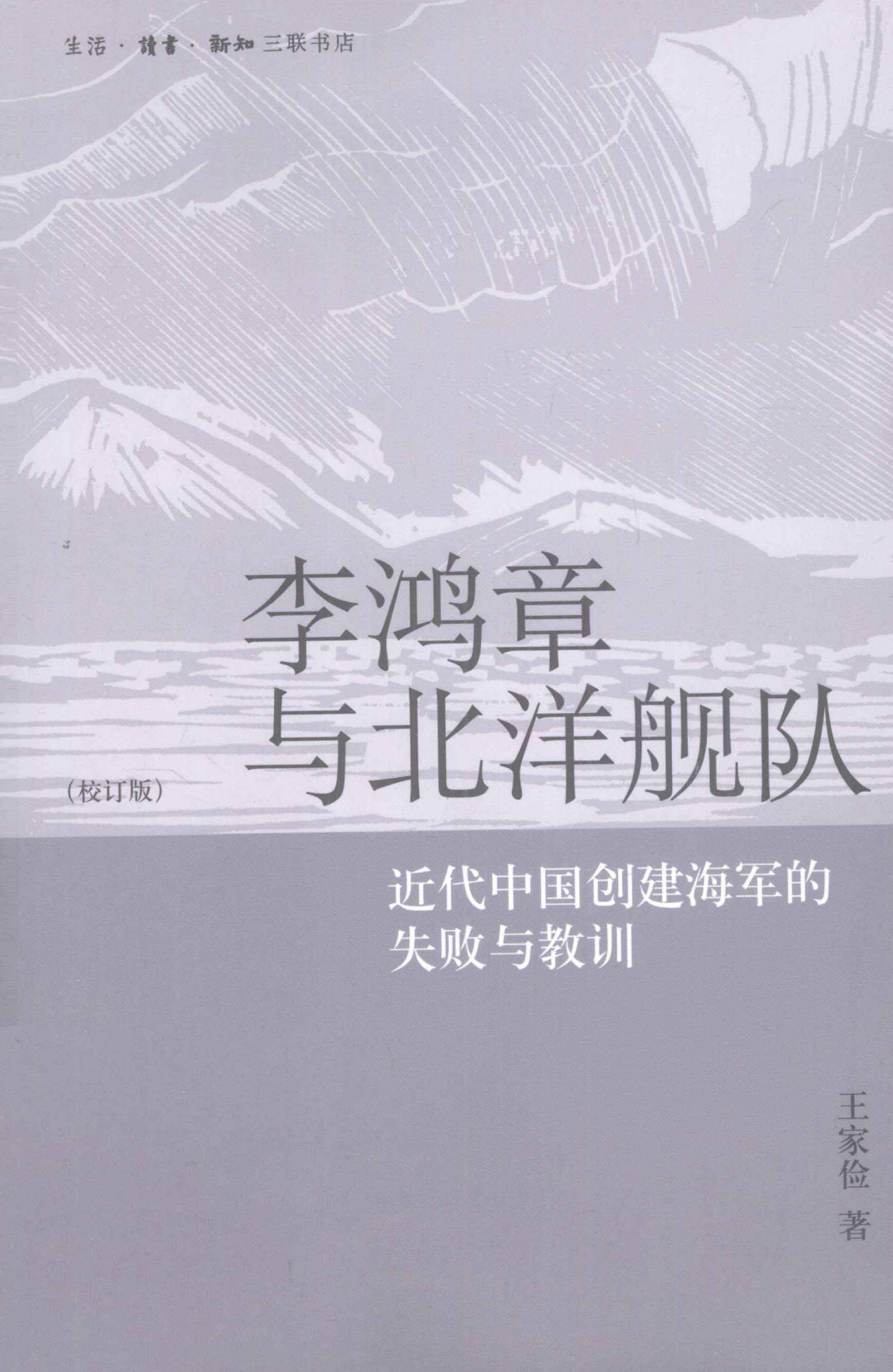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李鸿章 与北洋舰队

(校订版)

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
失败与教训

王家俭
著

李鸿章与北洋舰队

李鸿章 与北洋舰队

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
实践与教训

李鸿章与北洋舰队

王家俭著

李鸿章 与北洋舰队



近代中国创建海军
的失败与教训

(校订版)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C)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 / 王家俭著. — 校订本.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2

ISBN 978-7-108-02993-5

I. 李… II. 王… III. 北洋海军—军事史 IV. E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8296 号

责任编辑 孙晓林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32 印张 33.5

字 数 400 千字 图片 28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序 一

王家俭先生早年关于魏源《海国图志》等著作,提出世界知识与经世思想的问题,对学术界影响至为深巨。王先生兹凭借其二三十年来的研究,对19世纪中国水师及海军,以李鸿章创立北洋舰队,建筑船坞、基地以及培养训练人员等为主要个案,洋洋数十万言,蔚为一巨著。王先生对19世纪西洋海军之技术、设备,极为熟悉。兹则就李鸿章建立舰队之背景与经过,以及所牵涉到之财政制度与政治问题一一详论,深中窳要。笔者三读此书校样,凡笔者所能想到的问题,本书皆已有精详的解答;凡笔者所能想到的史料,如当时人的文集、日记、自述,以及英国外交部及海军部档案,王先生皆已细心利用。兹仅就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的政治地位问题,略作讨论,以供读者参考。

李鸿章(1823—1901)于1870年受命为直隶总督,这当然是省级官职。但是他又具有若干中央政府的职能。直督负有保卫畿疆的责任。李鸿章的淮军在直隶境内,有三十余营(每营约五百人)驻天津保定,及天津北京之间的杨村、河西务等地。^[1]李氏受命为北洋通商大臣,长驻天津(仅于冬间津河冰冻时在保定),接见各国公使,并随时与总理衙门联系。1874年日本犯台湾,李氏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任务包括山海关、辽东、山东等口岸。1879年日本并琉球,对朝鲜的威胁已显明。李鸿章筹款购置英德战舰。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立。在这中间,1885年清廷设立海军衙门,光绪皇帝的父

[1]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南京,1902),〈奏稿〉,卷17,页10下。

亲醇亲王奕譞出任总理海军事务王大臣,李鸿章与庆郡王奕劻为会办大臣。此项兼职,亦表示李鸿章有中央官的职能。

但是李鸿章虽然有北洋通商大臣、督办海防、会办海署等职务,在筹措款项时,必须有朝廷的准可,以及受命协济款项的重要督抚的合作。李鸿章的淮军,在1891年左右每年收入约220万两,由已有谕旨立案的下列各省厘金和海关关税接济:江苏藩库及湖北军需局(主要都是厘金),及江海关和江汉关的洋税。^{〔1〕}光绪元年(1875),总理衙门为海防筹款,曾与户部协商,奏准由下列各省关每年共筹400万两,分解南北洋为“海防专款”: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福建等省厘金;粤海、闽海、浙海、山海等关的“四成洋税”。但是因为当时各省关尚有更紧迫的应解之款,如惠陵工程(营造同治皇帝的陵墓),京饷(径解户部的要饷),以及西征协偿项目(提前供应左宗棠用兵新疆所需各省协饷,及各海关奉户部命分期偿还左宗棠所借洋债)。结果虽经李鸿章向各有关督抚呼吁,而海防专款解到北洋的,1875—1880年六年总共仅为应拨原额之30%;1881—1884年每年为应拨原额的51%—53%。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户部原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总额400万两全归该衙门,李鸿章的北洋海防经费改为由该衙门发给。结果,北洋海防经费实收略有增加:1885—1886年每年实收原额的71.5%;到了1887—1888年,每年所收则降到原额的56.7%。1889年北洋海防经费实收仅为原额的48%,但1890年增为原额的69%。是后一直到中日甲午战争(1894),北洋海防经费每年仅能维持原额的63%。

李鸿章如何利用上述款项购置英、德制之军舰,派遣福州船政局的优秀毕业生出洋深造,设立水师学堂,同时建立旅顺船坞,以供铁甲战舰维修之用,又经营大沽、威海卫等基地,建筑炮台?本书提供关于这些问题的定论。王先生同时也注意到设立海军衙门之年,也就是清廷决定大修园囿之年。起初是重修北京紫禁城内的三海(即今日犹存的中南海及北海)。醇亲王子总理海军衙门之外兼管

〔1〕 参阅王尔敏,《淮军志》(台北,1967),页282—283。

神机营。三海工程也由他主持(实际上乃由奉宸苑郎中立山总办)。三海工程于1885年动工,1888年修竣,费用高至586万两,其中挪用海防经费总数为140万两。接着慈禧太后要修建颐和园,工程处亦由醇亲王主持。颐和园的修建,自1888年开始至1895年尚未竣工,已用巨款1153万余两。其中由海军衙门拨款及该衙门报效共计92200两;而利用海军名义而设之“海防捐”及“海防新捐”(本书398页),计共达465万之多。李鸿章亦不能不为太后服务。先是,于1887年李鸿章曾应醇亲王之托,为三海工程向天津礼和洋行(名义上为德华银行)借款98万,奏准由闽海、江海两关分年发还——这是李鸿章第一次放弃他自定的不借洋债的原则。同年李氏在北京时(他每年都去北京至少逗留旬日),醇亲王要他写信给全国富庶之区的督抚,希望能集资200万两为“万寿山工程”之用。李氏当时以“恐难办到”为词,婉却其要求。但是,第二年醇亲王再来函催促,李氏乃作函与两江、两广、湖广、四川等省督抚,强调慈禧的丰功伟业,及光绪皇帝“为母后建园祝嘏之孝,……凡在臣子,敢不仰体圣主之心?”这次集款以“筹备海军用款”为名,连同直隶本省的20万两,共收260万。可惜的是这些资源不能用于续购船舰。1891年,户部为了借拨园工的压力(以及当时户部尚书翁同龢对海军之缺乏认识且对鸿章不同情),奏准明令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即将所省(现)银,解部充饷。北洋舰队自1888年成立后即不添一船;而日本即在此时添购新舰新炮。后来甲午战争的大东沟海战中,华舰不如日舰之速,为致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李鸿章如果坚持添购新舰,便是与颐和园工程直接竞争。这可能是他当时的一个主要考虑。太后他是不能得罪的。(本书403页)

1886年5月,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军,到天津传见淮军将领及水师提督丁汝昌并接见各国领事后,出海巡视,到旅顺、烟台往返十余日。在烟台并曾接见英、法海军高级军官。李鸿章(丙戌四月随醇邸巡海呈教)诗云:^[1]

[1] 《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李文忠公遗集》,李国杰编(1905;台北影印,1966),卷6,页19。

雕弓玉节出天阊，
士女如山拥绣裳。
照海旌旗摇电影，
切云戈槩耀荣光。
伫飞禁旅严千帐，
罗拜夷酋列几行。
德协谦尊齐赞颂，
力辞黄屋福威扬。

万千气象蜃楼高，
忽地齐烟涌六鳌。
慈佛护持看献瑞，
仙舟共济敢辞劳。
自怜坚壁心偏苦，
却愧屯田 诏屡褒。

无限临歧依恋意，
漫吟潭水答云璈。廿五送至北运河桃花口而返。
蒙诵“桃潭千尺”之句为别。

次年(1887)鸿章在北京时曾阅看昆明湖水师操演，有四首七言律诗呈醇亲王(外有五言诗六十韵)。^{〔1〕}兹钞录四首律诗中之二首，分别表达李氏办理海军之心志及其对自己政治地位的看法：

犀兕群推百炼锋，
阿童竞说水中龙。
即今海国争雄长，
何止滇池备折冲。

〔1〕《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李文忠公遗集》，卷6，页19至21。按李鸿章1887年所作之五言古诗六十韵为“醇邸召游适园”时所作。回到天津后复参照奕谿所赠之适园风景样式照相簿，改定其诗。此诗赞叹适园（奕谿在北京西城的园囿）规模宏大、林木花丛之美、楼台亭阁之清幽；惟最后十几句则以北京与古咸阳比较。并引仙佛思想，认为其极致仍不漠视现实。鸿章说自己并没有园林的寓所：平泉未有庄，石踪行就荒。骖骑不为家，敢谓忧匈奴。南望淮山深，慨然念故墟。

神策六军归上将，去岁始定议规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改隶神机营、海军衙门管理。

鬼方三载念高宗。健锐营为乾隆间征金川时奉旨创设。

车攻吉日还周雅。

喜复中兴覲盛容。

北军自将异他师，

位冠荆韩地不疑。

僚佐班高唐节度，

典章气肃汉官仪。

重瞻列庙行围处，

正值深官侧席时。

驻辇尚蒙慈寿诏，扈从道中召对，蒙皇太后垂询阅操事甚悉。

久知文母是轩羲。

刘广京谨序

1998年9月

序 二

老同学王家俭先生,于退休之后,犹研究不辍。继其过去近四十年之功力与成就,完成此一部四十万言之专书(monograph)——《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今行将出版,邀余为其作序。余虽对此一专题并无深入的了解,惟以不仅在大学时同班,毕业之后,复因同受业师郭廷以先生之影响,均对中国近代史有浓厚的兴趣;又都选择了此一领域,终生从事。数十年来,他以教书为主,一直在师大授课,却并未停辍过研究;我则以研究为主,一直在中研院近史所工作,但也长期在师大兼课。师大与中研院既同在台北一市,交通便利,又有电话相通,因而切磋琢磨,慰勉鼓励,亦数十年如一日。即其于退休之后,远赴加拿大定居,亦仍然书翰往还。其间还在各地学术会议中相遇。自然他每次返台,必定相见相叙,一如往昔。今嘱为其书作序,盛情难却,厚意深感。乃不揣冒昧,毅然为之,非不知一己之谫陋也。

“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而细阅本稿,深信于出版后,必定也会被认为是一本很有分量和很有贡献的专书。因为不仅在当时——晚清时期,即进入民国直到抗战胜利之前,海军的重要,几乎可以说是一直关系着中国的命运。所谓“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1874年,沈葆楨语),东南即指海疆。自鸦片战争(1839—1842)以来,历经英法联军(1857—1860)、日军犯台(1874)、中法战争(1884—1885)、甲午战争(1894—1895)、八国联军(1900—1901);入民国后,日军占领胶澳德租借地,沿胶济路进兵达于济南(1914)。九一八后,日军占领

东北(1931),攻击淞沪(1932),至于七七事变及八一三进攻上海(1937),展开全面侵华。这一切重大的外力入侵,无不由海上而来。其中,甲午战争中国海军的主力——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更是国防上转折的重要关键。中国的海军自此一蹶不振,直到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中国的海军,还没有一条吨位及武力可以与对方相抗衡的舰只。

北洋舰队为李鸿章所创建,从起始(同治年间)到终结(甲午)二十年间,历经极为复杂曲折,挫折困难纷至沓来。是以欲研究近代中国的海防,便不能不重视中国的海军;欲了解中国近代的海军,便不能不以北洋舰队为关键;欲检讨北洋舰队,便不能不重视李鸿章这一核心。王家俭先生以北洋舰队来检讨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不仅将李鸿章与其并列,而且将李氏置于舰队之前,实在是思考有素,观察深入的抉择。

过去对于中国海军史的研究,虽然并非无人,然能达到谨严之学术水准者,并不多见。至于深入海军之主体——北洋舰队——作完整的检讨者,更属“凤毛麟角”。综清末时期(1895—1911),虽也有不少的著作,但因震于甲午之惨败,其内容大体诚如本书“绪论”中所言:“皆以甲午战争为主轴,其中包括陆战、海战、外交,并不以海军为限。且其内容大多辗转抄袭,亦并非纯粹的著述。但为海军保留不少可贵史料和许多批评意见,可供日后研究海军史参考。”“清末对于海军史可谓有记述,而无有研究。”民初时期(1912—1949),虽然在量的方面,已较清末为增加,但质的提高,仍然有限。称得上学术性的成果,在专书方面仍然欠缺。论文方面,除张荫麟的《甲午战争中国海军战绩考》等极少数的文章之外,其余大多不够谨严缜密。海峡两岸分立时期(1950迄今),在长达近半个世纪中,诚如本书“绪论”中所言:“其间前期以军事对立,政局不定,故学术之研究亦难开展。自改革开放以后,两岸关系渐趋和缓,海军史的研究方日渐热络,尤以大陆为然。不仅有关海军史料发表日多,而研究人数亦大为增加,为海军史的研究投注一批新的生力军。至于研究的层面也愈来愈为广泛,而研究的水准也较以往提高。”关于

“北洋舰队”的专书,则以戚其章之著作最为受人注目(1981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在济南出版)。戚氏另有《甲午战争史》,于1990年由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出版。该书虽非专为北洋海军而写,但却于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的战斗与调度指挥,功过是非均有周详而谨严的论述。就凭这两本书(当然戚氏还有其他不少的相关著作),在中国大陆上有关北洋海军的研究,已经可以称得上允执牛耳了。两岸之外,在美国尚有 John L.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也应列于与北洋海军有关之一本深具水准的专著。

不过,环顾海峡两岸,以及国际间的著述,王家俭先生的成就仍有其独特的优长。第一,他是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甚至中国历史的学者,他治学的基础与范围均相当厚固与广泛,似并非为一般学者均能具有。第二,在这一研究成果繁茂的时期中,他起步较早,而且终生从事。他于1957年由桃园县的杨梅中学往省立新竹中学任教之后,便已开始。那时候,他有志于投考台大历史研究所,但报名的条件需要一篇论文或读书报告和一份日后的研究计划。他托我为他借到一套魏源的《海国图志》,回去逐细阅读。之后,他不但完成了一篇报告、一份计划,1960年也考取了台大史研所。在1963年,以“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一篇论文,获得硕士学位。随之被师大延聘回历史系任教,直到退休。四十年间,他的研究从未中断。诚如他的学生叶高树在他1994年8月退休之后,于中研院近史所的《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学人简介版中所综结:“综观先生三十年的研究业绩,阶段分明,自成体系。第一个十年,以魏源研究为起点,扩展为中国海军史研究;第二个十年,既掌握现代化与区域研究的学术动态,又将重心置于明清思想史的探讨;第三个十年,则分就魏源、思想史、海军史三大领域,进行总结式的研究,从而完成以海权与思想考察近代中国变局的体系。”由以上可以看出,他所治学基础与范围之深广,历时与专业之久长,均令人叹服。而于退休之后,集数十年之功力与成果完成本书,则不仅于其过去丰硕之著述中,益为增强其阵容;而于今之析论,亦更显其识见。以此衡量,在

台湾及其他海外地区的学者,于北洋海军的研究,亦罕有伦比。

本书就整体而言,架构宏阔、次第井然,于有关之重要问题,几均已纳入,且能前后左右呼应,并保持完整之体系。参阅文献甚广,且多为直接资料。如各国档案、当事人之遗留资料、报刊杂志、个人文集,以及当时人著作,后人研究的成果——专书与论文等。加以作者本身功力之深厚,乃使述事明晰,析论客观。既鲜标新立异,亦不附会世俗流言。不仅能据坚实史料,作忠实之叙述;并能缘篇章之宜,有重点之释论。务期历史之真实,得以重新建立。人事之是非,有允妥之判断。此均为本书最大之优长。本书对于李鸿章颇多称述,兹亦于此将个人之观感略加说明。

首先,李鸿章由于才气纵横,见解新颖,言辞锋利,本易遭人忌妒,引发诤议。曾国藩于保举他担当方面大任之时,特别称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见其对之提撕箴勉之深。故鸿章于军事进展顺利,初获中枢倚信之时,即随时展现其才华识见与气魄抱负。于同治时期成为总理衙门之外的洋务建设另一枢纽。其许多超越时代的见解,如今读来,仍深为人叹服。同治初年,他建言变更科举,加强科技人才培养与取用,已十分突出。同光之际,他对于海防与国家情势所作的分析:“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同时并指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9,页14)此种见解,何其深入洞彻!不论朝廷与地方文武官员,无人可与伦比。

及进入光绪一朝,鸿章的锋芒,并没有因批评诋毁而有所减淡。然自曾国藩、文祥相继谢世,恭亲王又失势于后帝,已无人能给予有力的支持。故鸿章虽因其本身之勋业才干,仍然得保其权位,却不可能减卸反对者加诸他的压力。光绪十年,朝局变动,恭亲王罢黜、醇亲王奕譞秉权,贝勒奕劻管理总理衙门。奕譞一向保守,缺乏远

见,不可能给鸿章充分支持。奕劻不仅能力不足,而且性格较为贪私,与鸿章更属貌合神离,甚至有所顾忌。即深具影响力且行事较为正派的张之洞、翁同龢,也各有其樊篱,难以协力,甚且更时有掣肘。至于那些为数众多的保守势力,就更不必说了。在皇帝和太后方面,只要看甲午战后的戊戌政变与庚子拳乱就可以知道。李鸿章仅以个人之力,如何能成就划时代的大事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假设晚清时期,自入光绪朝以来,没有李鸿章其人,情势又将会是如何呢?环顾当时人物,实在还找不出一个人能和他等量齐观。检讨海军,尤其是北洋舰队的建立与发展,如果没有李鸿章这个人,结果又将会是如何呢?至少,就笔者个人的观察,恐怕情况会更为恶劣。观恭亲王垂老时再出之懦弱无力;翁同龢之开缺回籍受地方官管束,八国联军后仍须倚李鸿章结束残局,以至于鞠躬尽瘁,便可以看出其轮廓了。尽管历史的进程,并不能假设。但史实的论断,却不能全然排除推理的功能。

兹再以梁启超的论评为例,梁氏与李鸿章可谓并世之人,又颇热衷政治改革,才华横溢,自视甚高。其《李鸿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书,撰成于光绪二十七年一月,距李鸿章之逝不过两月。故阅历人事,认识较真,体会较切。虽属撰述,仍饶富史料价值。在此书之中,梁对李鸿章时有批评指摘。但综合大体,却相当地予以肯定。他将李与左宗棠相比,谓:“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气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两人洋务之见识,不相上下。……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梁著《李鸿章》,页164)又将李与张之洞相比,则云:“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着着与鸿章为难,要其所划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至其虚懦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同上书,页165)

今王家俭先生著此书,既已尽其章节井然,脉络分明,资料详备,内容丰赡,使北洋舰队之历史与李鸿章之苦心经营,连为一体,重新呈现。复适时适地、于其中之利弊得失,以事实为之透视。最后并作总体性的总结,以探究李鸿章思想基础。认定仍在于儒学,并认同刘广京教授的见解:“鸿章具有儒学的经世思想,其所作所为即使在他功成名就之时,亦无明显迹象显示他已偏离了儒家的准则。”然后析论何以他未能触及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基本改造?认为实由于所处的现实环境使然。以当时中外局势之紧张,海陆同时告警,自强运动之所以军事为优先,实有其紧迫性与必然性。更何况当时政治权威和儒学权威都已发展到偶像化的程度。在君主专制和儒学僵化双层的约制下,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在从事维新时,本来即没有太大的空间可以放手去做。即使在局势紧迫之下,作有限的改革,也难免要遭受君权的约束和保守士大夫(如清流之类)的掣肘。(本书第十一章结论〔一〕)

然后再从李鸿章个人条件与处境,诸如他本身于海军知识阅历之有限,其地位与权限之不足,慈禧太后之自私而缺乏识见,枢垣大臣以至地方大吏之配合不足等,来解释其推行之困难;再以海军经费、人才、技术转移、训练教育等各方面作一检讨。亦及于整个国家之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等之不能配合。(本书第十一章结论〔三〕)最后更提出总结。认为:“为了保卫海疆,自必加强海防;加强海防,势必建设海军;而海军的强弱,则又必将影响海权的伸张。故海防、海军、海权三者,实为密切相关,连为一体。而李鸿章的海防策略之由近岸防御而近海防御;由近海防御而远洋防御三度的演变,亦殆与海军军力的发展隐相配合,殊非偶然。虽然甲午一战,丧失海权,但前人的努力亦非白费。遗规犹存,经验宝贵,可资借鉴。而其他诸多的典章制度、组织法规、教育训练,以及一系列有关海军设施,亦皆为中国海军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形成为中国未来大海军发展的一个新传统。”(本书第十一章结论〔四〕)

以上已将所有对王家俭先生本书之观感,作要略之概述。惟个人之意见以及征引梁启超之论评,虽然多与本书相契合,但却均属

直观与感受。诸如自甲午战后,百年来叙论及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者,何啻数十百家。而惟有王家俭先生谨严客观整体深入所完成的本书,最有资格作为定论。诚然在数千年所历经的时光长河之内,在九万里所发生的人事纷纭之中,不论李鸿章与北洋舰队,均不过永恒中的一刹那,沧海中的一粒粟。从而这一本著作,在汗牛充栋的史书中,其贡献自不宜强调。惟真理永恒,这本著作于史学的求真求实,人事的是非分明,其裨益却将不可磨灭,存诸永恒。

吕实强

1998年8月25日于台北市

南港中研院近史所

序 三

同门学长王家俭先生，德望冠时，名重士林，学殖深厚，著述宏富。生平治史，兼长清代与近代，各具重大建树。通识清代学术、政教、制度、外交、军事以至各色人物品鉴。惟毕生专擅，以研治近代海防海军致力最勤，成就最大。同道学者，一向推尊为近代海军史名家，四十年来，久著令誉。历来常读家俭所著有关海防海军之书已不下四种之多。今复拜读其新出巨著：《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自是当代学术重大贡献。当视为清代海军史之总要，足备清史典制之一格。

研究历史，近世学界恶习，不就史料史实建树正确基础，徒务凭空创设理论欲求倡为解释之管钥，立定典范之标帜。自是凭恃聪明，假借识断，急求结论，竞图创新。于争奇斗艳之中，为惊世骇俗之言，自然逞快一时，必至贻误后生。前此之论次人物，诬曾国藩为“刽子手”，诋李鸿章为“卖国贼”，讥盛宣怀为“买办官僚”。自是不费心力，任情讥弹，省力省时，标签鲜明。再加上一时政治倾向，否定前代，挾伐旧物。遂至迅速流布，天下披靡，人人视为不刊之论，至理名言。真是谈史之家何其易为如此？

有关李鸿章之诬论，所见岂少哉。世论之谬悠，铺天盖地而来，政治首脑亦引用为口头禅。实正淹没先代重大功绩，抹杀前人智慧心血。不识史实真相，乃学者之孤陋，妄言诬蔑前史，尤负士人天良。欺愚当世，罪不可逭。我人所见此类谰言论史者，何其多如牛毛。

家俭治史，投入近代海防、海军、海权之领域，凡四十余年，积以